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 培育研究

刘鑫淼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 培育研究

刘鑫淼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王 舒

版式设计:李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刘鑫森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7-01-009176-1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社会公德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D64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1162 号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

DANGDAI ZHONGGUO GONGGONG JINGSHEN DE PEIYU YANJIU

刘鑫森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义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176-1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随着学界对公共领域、公共性、公民社会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公共精神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理论论题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剧变,公共生活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由此所带来的对公共生活领域及事务的实践批判与人文反思。由于公共精神涉及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对公共精神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概念模糊、理论框架松散、学术传统缺乏的领域。然而,这并不妨碍公共精神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课题,特别是作为分析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范式。

对公共精神的讨论,我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一是实然层面,这意味着在现代性的推动下,公共领域不断被开显出来,人类的公共生活日趋活跃与丰富,大量公共事务纷至沓来,对于公共性的价值预设、公共领域的样态描述、公共行为的制度规范等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课题。当前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个体自主性获得极大解放,但在公共领域中的个体行为并没有外展而是呈内卷之态势。社会公德淡漠、民主不甚昌明,一些官员假公济私、部分民众自私自利,于公共事务不闻不问,冷漠旁观,这可以看做是讨论公共精神的实然动因;二是应然层面,这意味着公共精神作为现代性的表征之一,将是每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与国家必须完成的国民性改造任务。早在19世纪,严复便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国民性改造主张,梁启超、马君武、林语堂等五四期间新文化运动思想家也曾从不同角度谈论过“公德心”、“公共心”、“公共意识”等问题,指出公共精神之培育对于中国民众的启蒙,对于推进民

主政治的重要意义。以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看,公共精神的建构显然仍是“未竟之现代性事业”,如果现代化的中国是民主文明、富强昌盛、公平正义、和谐共荣的共同体,那么这将是讨论公共精神的应然向度。

刘鑫淼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选题富有创意与灵感,是对公共精神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一个可贵尝试。尽管带有教科书式构思框架的痕迹,但对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方式可以简明扼要地勘定研究主题,并以思维进阶的方式来明晰研究主题间的逻辑关系。从内容上看,该研究具有涉及面广、现实切入深、学科跨度大、论述思路灵活等特点,在阅读过程中总能感受论者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发人深省。主要体现在:一是把理论背景设定为现代性社会,这就使得公共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公共性与政治性关联在一起,特别是与近现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关联起来,并试图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新的解释框架,这可以看做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二是把公共精神看做是“人类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人类理性的公共运用”、“人的类意识的伦理表征”,并概括出一个具有通约性的关于“公共精神”的哲学定义,相较于以往的关于公共精神的理解,这个概括更具历史厚重感和价值穿透力,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更加明确了公共精神的研究领域及实践价值;三是通过对公共精神的历史考察与横向比较,指出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滞后的精神与文化归因:传统文化土壤中缺乏对“公”的培育倡扬,民族品质中缺乏对于“公共性”的价值追求,社会结构中缺乏对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界分等,这些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具有较强启发意义的;还有,该研究提出培育公共精神的若干路径,当中提到的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公民教育等,一方面,既是该论题的逻辑结果,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的现实课题与时代任务,另一方面也从公共精神的角度深化了对这些现实课题与任务的认识,确认了这些时代任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鑫淼勤思好问,专业功底扎实,理论视野开阔,尽管国内学界对于公共精神的研究成果不多,资以参考的文献资料不甚明显,他还是迎难而上,潜心专研,论文答辩时获得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一致好评。现在论文经过修改

并能够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作为他的导师,由衷为他高兴!也祝愿他今后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钟明华

2010年10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CONTENTS

序	钟明华 001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二章 公共精神的一般理论	020
第一节 界定与阐释	020
一、对公共精神的界定	021
二、对公共精神的阐释	033
第二节 演进与分类	038
一、公共精神的演进	039
二、公共精神的分类	044
第三节 范式与功能	051
一、理论范式	052
二、建构功能	056
第四节 内涵与张力	060
一、集体主义精神与公共精神	060
二、社会公德与公共精神	066
三、公众舆论与公共精神	070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公共精神·····	074
第三章 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公共精神·····	079
第一节 从自我澄明到契约达成·····	080
一、自我澄明:启蒙运动的使命·····	080
二、契约:启蒙后的人的交往样式·····	084
三、契约的公共精神·····	086
第二节 公共性:现代性政治的抉择·····	090
一、公共性的现代开显·····	091
二、政治现代性的意涵·····	093
三、公共精神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095
四、公共精神与政治合法性的重置·····	098
五、公共精神与分权制衡学说·····	102
第三节 市场经济伦理与公共精神·····	105
一、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	106
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110
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14
第四节 当代西方公共精神的内在困境与启示·····	118
一、西方现代性脉络中的公共精神实质·····	118
二、以个体私利为基础的公共精神危机·····	121
三、以个体私利为基础的公共精神的启示·····	124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精神吁求·····	128
第一节 “公”“私”观念的理论棱镜及现代定位·····	128
一、中国在倡立公共精神问题上的困惑·····	129
二、“公”“私”观念的理论棱镜·····	130
三、“公”“私”观念的现代定位·····	134
第二节 崇公抑私的意识形态·····	138

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139
二、“天下为私”的逻辑归宿	142
第三节 私密化的社会结构	145
一、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146
二、“内卷化”的社会特质	150
第四节 缺乏公共性的公共权力	155
一、为什么权力是“公共的”	156
二、政治现代化就是要还权力以“公共性”	158
第五章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	162
第一节 建构公民社会	163
一、公民社会:公共精神的现代载体	163
二、建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条件和特点	171
三、建构公民社会如何可能:原则和策略	175
第二节 践履民主政治	179
一、民主政治:公共精神的根本体现和落实途径	179
二、善治:彰显公共精神的社会管理新理念	189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创新	195
第三节 提升公民素质	199
一、公民教育:培育公共精神的根本途径	200
二、中国现代化语境中的公民教育	207
三、中国公民教育的路径选择	211
结束语 培育公共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219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30

第一章 导 论

一、公共精神:人的现代化的品质诉求

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的生活样态,对公共性的守护和澄明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和归宿。因此,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在对公共性的选择性生成、主体性认定、科学性矫正基础上之逐渐展开、澄明、完善和践履的历史。公共性作为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本质和价值,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人们所理解、体认和占有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才被真正确立起来。公共性的确立必须以个体的理性自觉和自由平等为前提。在前现代的经验文化模式下,由于绝大多数个体是按照经验、常识、习俗及惯例而自发地生存,这种状况谈不上真正的公共生活,也就无公共性可言。只有当个体超越了纯粹的自在自发的生活视阈,进行自觉的、理性的和科学的精神再生产,并与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发生实质性的关联时,真正的公共性才会被确立起来。这个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现代化的历程。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相互依持、相互制约的。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与核心。美国政治学者 D. 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指出:“现代化主要是——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及让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人格系统上有所调整,也即必须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①现代化最终要表现为人的行为方式和生

^①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p. 73.

产方式的改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①现代化在改变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同时,也促进着现代人价值观念及精神文化的转型。公共性则是现代社会开显并秉承的主要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精神是现代人主要的人文价值诉求和人格特质。

从社会文明的演进历程看,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公共性逐渐呈现的过程,它直接推动了人类公共活动领域的展开和公共生活的出现和丰富。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人的交往方式的变革和人的活动生产领域不断扩张,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公共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活动的渗透,使人们在相对的意义了解脱了来自私人领域事务的束缚,推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出现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私人生活领域,并真正确立起公共生活领域。也正是经济的推动,使人们从私人领域事务中走出来,开始从容、自如地追求安全、生理需要基础上的自尊和自由意志的实现。通过参政、议政、交往结社等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and 提高生活素质。在精神层面,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开启了人的自我澄明和理性主体的确立征程。作为独立、自由、平等、自主的个人终于出现在历史上,进而以自觉理性和自主行动自信地步入了由资产阶级革命所开辟和催生的公共生活领域。当主体性、自由、个性、自我意识、批判精神等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性特质和规定性的时候,社会整体的普遍心理、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也必然发生根本的变化。吁求平等、民主、和谐及正义等必然成为人们普遍的社会文化精神要求,承载着理性、公义和独立平等价值的公共精神则成为了有别于传统社会成员的人文价值情怀的精神样态,这也成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从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往往表现为一个从“领域合一社会”到“领域分离社会”分化和整合的变迁过程,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身份等各个层面呈现不断分化和拓展的态势。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及功能剧烈调整的过程中,对公共性(如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社会资本、公共美德等)的守护和累积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页。

成员的公共精神状况决定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美国经典现代化理论学派成员艾森斯塔德指出,现代化就是分化和整合的过程:“首先是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它既包含各种结构的分化和变形,又包含着持续变化的结构形式、活动和问题,以及持续变迁和制度变革的倾向……因此,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①其实,社会整体中的任何变革都将牵扯到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其间必然会产生大量社会冲突及矛盾,要对这些冲突、矛盾进行适度的调控无疑犹如行走在钢丝之上,其艰难和困苦自不必说。在这样的境况下,凝聚人们的思想资源,铸造共同的价值观,培育人们的公共精神,规导人们的利益诉求,就成了社会转型之精神文化使命,这也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

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之所以艰难曲折,与公共精神的缺乏不无关系。传统中国“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及注重家族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被投射到一个全球化背景中国与国竞相争先的开放时代,不是显得空泛就是显得狭隘。作为人的现代化表征的公共精神长期被指认为工具价值意义上的权宜之策,尽管近代中国曾有过一段时期极力主张“引入”西方公共精神,但由于无法明了作为现代化的“公共领域”与作为现代性的“公共精神”之间的关联及张力,最终致各项努力均无法奏效,让人深感惋惜。其实,对现代化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的论证,和对于现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取代。作为现代性的公共精神,它反映了在现代社会公共性彰显的情况下人们理性的公共运用的现实,代表着时代先进文化中为人们所认可和恪守的共同价值诉求,因而不是我们说要拒绝就可以拒绝的。作为现代性的公共精神必须与现代化的实践相辅相成,割裂它们两者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断显现出来;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着人们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展和丰

① 【美】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富,公共事务日益增多,人们日益频繁地参与公共事务和参加公共生活。这在客观上也提出了培育现代公民公共精神的时代要求。特别是在现今经济体制尚处于调整转轨的情况下,人们原来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时无法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支柱,社会风气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新出现的公共生活领域急需共同的价值规导和人们的理性自觉自律,人们对公共精神的吁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这也说明,当代中国要进一步顺利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就必须首先推进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培育作为现代公民的公共精神品质。培育公共精神,将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文明基础。作为具体的层面,如何型塑现代公民人格,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及构建和谐公共生活,则是激发笔者展开本专题研究的缘由。

二、研究背景及状况

公共精神作为一种表征现代性的精神样态和品质,实际上已贯穿于近代中国整个追求现代化的历程。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在中西对垒中落难危急之时,学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实际上就开启了对公共精神的讨论。

(一)严复是近代中国较早、较系统地从理论高度解释中国积弱原因、中国如何求富强以及中学与西学之间关系的为数不多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中西之间的差距,绝不是单纯的船坚炮利问题,也不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教化问题或尚虚与尚实的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在《辟韩》中,他指出:

“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①

^① 严复:《辟韩》,转引自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在《论世变之亟》中,他指出: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絀也。”^①

这里,严复提到中西在社会秩序之建立基础上的差异:“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而西方人则建立在公上。”“孝”作为中国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核心,相信是没有什么太多争议的。“孝”是维系家庭和国家的基本伦理;“孝”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也即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义务。“忠”、“孝”、“仁”、“义”组成了传统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四根柱子。传统中国也即成了一个“家天下”的格局和社会结构。所以他提倡的“新民德”,就是要上下一心,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皇帝一人私天下的制度,代之以合天下之私以为大公的制度,具体办法是学习西方,建立议院,实行普选制。增强民众权利意识,提高公德心和爱国心。

(二)把这一问题运用于国民性的批判上,尤以梁启超为著名。在其《新民说》中第五节《论公德》中,他说: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②

他同时看到: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天津《直报》1895年2月4日至5日。

② 梁启超著:《新民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出者,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①

“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不复知公德为何物。”^②

正是基于中西社会、文化、政制、经济等之比较来找寻中国积弱的问题意识,梁启超提出了其极富魅力的维新改良方案。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日渐衰落,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公德,没有新道德。

“虽然,彼官吏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两重责任乎?此皆由知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进,国华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于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间一私人更无论也。我国民中,无一视国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③

所以必须首先“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我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以群力促国力,则国家何患不强?

(三)可以说,梁启超的公私德说开启了近代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新视域,后来的许多学者循着此一思路和问题,抨击中国人缺乏“公共心”、“公德心”等,形成了20世纪初年学界经久不息的声音。马君武在《论公德》一文中详细探讨了公德与私德的辩证、欧美公德发达之原因等:

“私德者何?对于身家上之德义是也。公德者何?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

论者动谓中国道德之发达,于公德虽阙如,而私德则颇完备,亦六(经)之所陈,百儒之所述,似于私德已发挥无余韵矣。呜呼!中国之所谓私德者,以之养成驯厚谨愿之奴隶则有余,以之养成活泼进取之国

① 梁启超著:《新民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② 梁启超著:《新民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③ 梁启超著:《新民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民则不足。夫私德者，公德之根本也。公德不完之国民，其私德亦不能完，无可疑也。欧美公德之发达也，其原本全在私德之发达。……夫人必能爱自由，而后其人格乃尊，为一国中之主人，不为一国中之奴隶。而中国私德之提倡爱自由者阙如，下则放弃其自由，上则妄侵人之自由，而中国人遂以能服从异种之令名，著闻天下矣。故私德之与公德也，乃一物而二名也。私德不完，则公德必无从而发生。若徒指束身寡过、存心养性、戒慎恐惧诸小节为私德完全之证，是乃奴隶国之所谓私德，非自由国之所谓私德也。”

“中国人有恒言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其言岂不美乎？然因中国人之无诚实也，故常能言而不能行，虽极美之言，亦徒用之为作文之资料，口头之谈柄而已。”^①

马君武对公德与私德之分析可谓入木三分，精辟通透。他敏锐地意识到公德与私德之界分的现代性语境，呼吁国民之真权利、真自由、真自治的实现，较早地提出了国民现代性的改造问题。在公德与私德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上尤为精彩，对传统中国之道德特性进行了揭露，对于后来中国现代性伦理的展开具有较大影响。

（四）革命文豪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对当时国民曾产生极大影响。他提出的“救国十要”中的“第二要”就是“讲公德，有条有纲”：

“列位！你看我们中国到这个地步，岂不是大家都不讲公德，只图自利吗？你不管别人，别人也就不管你，你一个人怎么做得去呢？若是大家都讲公德，凡公共的事件，尽心去做，别人固然有益，你也是有益。……列位！为人即是为己，为己断不能有益于己的。若还不讲公德，只讲自私，不要他人来灭，恐怕自己也要灭的。”^②

《猛回头》以这样一种动人的说唱形式、通俗深刻的论说，表达了对祖国的满腔挚诚，在辛亥革命时期众多的宣传品中是出类拔萃的。书中所表达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浓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当时人们起来进行革命

① 马君武：《论公德》，载《政法学报》癸卯年第1期，1903年4月27日。

② 陈天华：《猛回头》，见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6页。

斗争的有力精神支柱。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日本部分报刊反而对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为进行冷嘲热讽。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撰文称：“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今，此亦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他们的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陈天华见报，愤不欲生，遂决心以死抗议日本，唤醒同胞。当日，他挥笔写下《绝命书》，勉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五）“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中西方国家之国民性也作过差异比较。在一篇《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则以安息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①在忧时感事之时不免对国民性有偏激之言：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②

“呜呼！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③

陈独秀对中国人之政治观的改造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传统中国人对政治的参与和讨论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普通百姓对政治也是敬而远之、缄口不谈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四以前的《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专在介绍西方学说，抨击孔孟儒学，专在知识分子方面。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以代表“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须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④

（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同样是深刻到位的。他较早地意识并推动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7—100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2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0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8页。